

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工业发展探析

田 霞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陕西工业获得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于陕西在战时所处地位发生变化、内迁工厂影响、国民政府重视、当地商品市场扩大以及工合运动推动等因素造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典型的战时经济及“嵌入型”经济特征,民营企业也出现了集中化现象。尽管陕西战时工业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它毕竟保证了战时军需民用,稳定了西北大后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国工业布局,对陕西的经济结构转换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陕西工业 工业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前,陕西省的近代工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仍然停留在低速度、低水平和几近手工操作的状态之中,地域和行业上的不平衡性比较突出,传统手工业在当地经济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凭借其武力优势迅速推进,工业比较集中的华北、华东地区已大部沦陷。同时,港口被封锁,铁路被破坏,抗战后方的对外交通十分困难。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定西安为西京,以陕西为中心的大西北成为抗战依托的大后方。这种战时环境的改变,加上一批东部沿海工厂内迁以及战时军需民用物资的严重匮乏,都极大地刺激了陕西工业的发展,使抗战时期陕西工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 发展概况

这一时期陕西的工业发展状况可大致划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两个方面。

(一) 重工业的发展

陕西的能源工业在抗战期间得到突破性的发展, 其中煤炭工业的发展成绩最为显著。1936年以前, 我国国内煤炭业一半以上的市场为外资占领。据矿业联合会所编1934年度国内矿业概况一览表所载, 当年全国煤炭产量为3270万吨, 其中, 约有200万吨找不到主顾。^① 由于市场狭小, 加之地处内陆, 交通不便, 因而截止抗战爆发前, 陕西的煤炭业发展极其缓慢, 基本处于传统的手工开采阶段。全省煤矿50多家, 其中用机器开采的只有4家。1937年煤炭产量21万吨, 不及上一年全国产量3934万吨的6%。^② 抗战爆发后, 由于大量工厂西迁和人员西流, 陕西的工业用煤和居民生活用煤日趋紧张。而战争又使得晋、豫等地煤炭入陕的路线被切断, 使煤炭资源极为丰富的陕西省1938年后竟出现了连续两年的严重煤荒。为了解决煤炭紧缺问题, 1939年, 陕西省政府与陇海铁路局合资200万元开采同官煤田, 同时, 督导各县提倡招商大量开采, 铺设渭白轻便铁道, 并由陇海路局兴修咸同支线, 以利运输。1942年铁路修至同官煤矿。次年, 机械设备及升降机安装完毕, 累计修成井筒12个, 使同官煤矿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唯一大型

^①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15页、第925页。

^② 陈舜卿:《陕西的煤炭业》,载《陕甘近代经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现代化煤矿，每日可产煤200吨。^①除了同官官矿场外，使用机械生产的还有陇县新陇煤矿、白水新生煤矿公司、同官民立煤矿公司、同官同泰股份有限公司、彬县民生煤矿公司、蒲城新兴煤矿公司及协建煤矿公司等企业。^②截止1945年，全省共有大小煤矿92个，年生产能力已达92万吨，为1937年21万吨的4倍多。^③

能源工业中的另一个重要部门——电力工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抗战爆发前，陕西的电力工业极其落后。1936年，全国有电厂460家，发电容量631165千瓦，发电度数为1724305千度，而陕西省只有电厂1家，发电容量为709千瓦，度数为628千度。^④七七事变后，1936年建立的西京电厂增设1600千瓦发电机一台，加上原有电机，每日发电1350至2000千瓦。1942年资本额增到265万元。西京电厂另设宝鸡分厂，系购电转供。1939年10月资源委员会在汉中南郑设汉中电厂，有职工88人，资本50万元，1942年增至184万元。同年，宝鸡电厂资本达400余万元。1943年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设立王曲电厂，初设时有两台30千瓦煤气发电机，1944年归西京电厂代管。1945年汉中水力发电工程处在南郑成立，有工人126人，职员23人。西京电厂、汉中电厂发电容量达2520千瓦。^⑤

抗战时期陕西的化学工业主要是酸碱制造业和酒精业。其

① 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编印：《陕西经济十年（1931—1941年）》，1997年12月印，第142页。

② 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编印：《陕西经济十年（1931—1941年）》，1997年12月印，第144页。

③ 陕西省政府统计室：《陕西省政府述要》（1946年7月），第65页。

④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894页。

⑤ 以上数据参见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893页；虞宝棠编著《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4页。

中, 1933 年在西安投产的集成三酸厂到战时已扩充成为西北最大的化工企业, 1940 年时资本增至 12 万元, 有职工、工人及学徒 87 人, 1941 年产量较战前提高了 3 倍以上。^① 该厂为达到产、供、销立足西北, 在蒲城县建立集中磺矿公司, 在泾阳县开办硝厂, 利用当地资源为西安集成三酸厂提供原料, 使硝酸产量保持稳定。集成三酸厂为抗战时期陕西军工企业提供了必需的原料, 也为陕西省的制革、印染、火柴等轻工业及交通、建筑等民用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保障。同时, 酒精厂由战前的 1 家增至 10 家。新厂中以中国银行雍兴公司 1939 年创办的蔡家坡酒精厂最大, 1941 年日产酒精 2000 加仑。大华纱厂酒精厂、褒城新亚酒精厂日产 400 加仑以上。^② 制药行业成绩突出的要数西北化学制药厂。1937 年, 陕西财政厅长韩威西与薛道伍集资 7 万元创建了西北化学制药厂。该厂 1939 年的营业额为 90 余万元, 盈余 3 万余元。职工发展到 600 多人, 产品由几十种增加到 500 多种, 一些药品供给陕甘宁边区。其中, 用中草药制成的“咳立平”、“新美乐”还打进了国际市场。^③ 该厂还设有当时陕西省仅有的药学专科学校, 为陕西省的医药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机器是百业之母, 机器工业的萧条意味着整个工业的萧条。抗战前, 西安仅有几家机器厂, 以生产军械及纺织机器为主。战争爆发后, 沿海东部先后有 181 家机器工厂内迁, 其中, 8 家迁入陕西。^④ 至 1943 年先后又有十几家机器厂设立, 使当时陕西的机器制造厂达到 57 家, 有资本 772 万元, 工人 2151 人, 分别占当时全

^① 魏永理:《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24 页。

^② 陕西省档案馆藏《陕行汇刊》,第 7 卷第 2 期,第 8 卷第 2 期。

^③ 参见《陕西文史资料》第 12 辑,第 189—190 页;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编印:《西京市工业调查(1940)》,1997 年 12 月印,第 39—41 页。

^④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第 825 页。

省工业厂数、资本总额及工人总数的 23%、1/9、1/6。^① 其中，新成立的骨干机器制造厂有 13 家，如陕甘工厂（1938 年）、建国机器厂（1939 年）、洪顺机器厂（1940 年）、西北机器厂（1940 年）、建中机器厂（1941 年）、伟中公司西安机器厂（1943 年）等，从纺织机械到水利、造纸、印刷、面粉、矿山、化工机械及汽车配件，基本上形成了体系。

此外，陕西的钢铁工业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近代以来，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极为缓慢。1931 年，国内生铁产量为 478035 吨，钢产量为 15000 吨，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 0.86% 和 0.021%，至抗战爆发时，国内钢铁需求量的 80% 依靠进口。^② 与全国发展水平相比，陕西的冶铁业又落后得多。1937 年陕西的铁矿石产量为 800 公吨，仅占全国 274700 公吨的 0.3%。^③ 抗战爆发后，由于陕西工业中机器生产日渐普及，这就为冶铁业的发展增大了市场。据 1942 年统计，陕西炼铁厂有 9 家，其中，宝鸡的陕西冶铁公司资本达 200 万元，建于 1940 年的第二战区耀县铁厂资本额 60 万元，拥有 5 吨炼铁炉及热风炉 1 座。^④

（二）轻工业的发展

由于轻纺工业与民用、军用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加上陕西良好的原棉、毛供给条件，因此战时陕西的棉毛纺织工业得到显著的发展，尤其棉纺，形成关中经济带。1937 年，上海华商纱厂共有纱锭约 1111408 枚，线锭 122666 枚，织机 8754 台，而盛产棉花的陕

① 参见岳珑主编：《结构！结构！20世纪陕西经济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 页。

②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第 749 页。

③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第 756 页。

④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第 773 页。

西省却只有纱锭 11960 枚, 线锭 1150 枚, 织机 320 台。^① 战前, 陕西仅有棉纺织工厂 2 家, 到 1942 年, 新兴棉、毛工厂即发展为 36 家, 占当时全省工厂总数(154 家)的 23.3%; 资本总额达 20736400 元, 占全部工业资本的 47.1%; 工人 4385 名, 占全部工人的 37.2%。其中, 又以大华纱厂、咸阳纺织厂、申新四厂宝鸡分厂、雍兴公司蔡家坡纺织厂 4 家规模最大, 资本亦最雄厚, 总计 4 厂资本合计为 17000000 元, 占纺织业资本总额 81.9%, 占全部工业资本的 38.6%。^② 抗战结束时, 陕西年产纱增至 48300 件, 布 522092 匹, 使陕西纺织设备能力突增了 5—6 倍。^③

轻工业除棉毛纺织外, 陕西的加工业在抗战期间也有很大发展。抗战开始后, 火柴厂接踵建立。据 1940 年税务署记录, 全省有 6 家火柴厂, 年产火柴 1.8 万余箱, 基本达到自给。机制火柴厂只有中南火柴厂和益汉火柴厂。

抗战初期, 我国损失了 50% 的机制面粉厂, 产粉量损失 60% 以上。^④ 由于战时军需民用面粉大幅度增加的刺激, 陕西机制面粉业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工业门类。总计西北战时共有 30 余家机制粉(米)厂, 其中陕西一省就有 25 家(内含 4 家机制米厂), 占 80% 以上。1942 年, 陕西的机制粉几乎占到国统区产量之半。其中登记的较大规模的 12 家总资本由战前不足百万猛增到 3931 万元。^⑤ 规模较大的有华峰、成丰、福豫、大新、和合泰记等家。面粉加工业的利润也很高, 如西安华丰面粉厂, 1941 年纯收益达 38.8

^①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 第 235 页。

^② 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编印:《陕西经济十年(1931—1941 年)》, 1997 年印, 第 176 页。

^③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 第 273 页。

^④ 徐盈:《中国的工业》, 载重庆《大公报》1939 年 10 月 11 日。

^⑤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 第 409—410 页。

万元,利润率达64.6%。^①

抗战期间,陕西的机制烟业日渐发达。据统计,战时共建西安利华、秦丰、益群、岐山华胜、蔡家坡大来、宝兴及凤翔7家机制烟厂,共有卷、切烟机30部,以投资100万元的秦丰烟草公司最大,月产华山牌香烟500余箱。到1944年,全省共产纸烟达107种,品级分一、四、五级3种。^②

机器造纸业和印刷业也发展起来。西安共有5家机制纸厂,规模较大的是1938年成立的协兴造纸厂和1939年成立的益生造纸厂。陕西协兴造纸厂,日产白报纸、纸版各2万张;益生造纸公司,资本40万元,日产印刷纸、新闻纸30吨。^③陕西印刷业由于抗战宣传的需要而发展很快。建于1896年的秦中书局在经历了几次名称及产权变动之后于1938年由陕西省银行作价接收,改名为启新印书馆,承印各种书籍及刊物表册。1940年时拥有铅印机、石印机、铸字机、划线机等大小机器三、四十台,职工124名,年营业额约为35万元。^④截至1944年,陕西省的印刷厂已由战前13家增至93家,其中拥有四开机以上者13家,共有各种铅印机147台,其它印刷机械200台。新办较大者有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印刷机15部)与雍兴公司长安印刷厂(资本35万元)。^⑤

其他工业在抗战期间也有发展。全省制革业战前只有13家,到1940年时,仅西安市就有新式皮革厂6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30多家。新开办的主要有1939年金城银行开办的陕西制革

①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1386页。

② 陕西省档案馆藏《陕行汇刊》,第8卷第3期。

③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935页。

④ 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编印:《西京市工业调查(1940)》,1997年12月印,第90—92页。

⑤ 陕西省档案馆藏《陕行汇刊》,第8卷第1期。

厂、通商银行开办的大华制革厂、李仙洲兴办的永昌制革厂等。而其中规模最大的动力工厂要数新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化学制革厂及长安制革厂 3 家, 共有资金 75 万元, 占全省制革业总资本的 78%。^① 新履在洛阳、兰州建立了分厂, 3 厂产品远销西南各省, 楷胶还出口海外。

二 繁荣原因

抗战时期, 陕西近代工业无论从厂家数量、资本总额, 还是设备及行业分布上都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探究造成工业繁荣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陕西在全国所处地位发生变化。抗战爆发前, 由于历史原因, 历届政府都将经济重心放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 陕西只是一无足轻重的内陆省份。然而, 战争一开始, 沿海地区的工业即成为日军的直接攻击目标。敌人对沦陷区工业的破坏和掠夺, 使中国工业遭受了严重损失, 我国失去纱锭数的 60%, 布机的 72%, 机器制造的 83%, 缫丝业的 50%, 面粉业的 80%, 还损失了制碱业的 82% 和盐酸业的 80%。^② 加之日军对中国沿海港口实行严密封锁, 又先后切断滇越、滇缅交通, 使中国争取外援的路途几乎断绝。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政府只有大力营建西南、西北大后方, 将其作为支撑抗战的战略基地, 才能最后赢得抗战的胜利。而陕西是西北大后方的重心所在, 自然成为抗战的依托。这种地位的显

^① 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编印:《西京市工业调查(1940)》, 1997 年 12 月印, 第 68 页。

^② 徐涤新:《抗战以来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 载《理论与现实》, 1942 年 2 月, 第 1 卷第 4 期。

著变化,成为陕西战时工业迅速发展最直接的主要原因。

第二,内迁工厂的积极影响。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战火蔓延,东部地区先后有42家工厂迁到陕西,在内迁工厂中,仅次于迁川和迁湘的厂数。共带来机器设备1.5万吨,技工760人。按行业划分,计有纺织业19家、机器业8家、食品业8家、化工业3家、另有印刷和卷烟等其他行业4家。^①这些内迁工厂大都是资金雄厚、设备先进、管理科学的代表当时国内工业发展最高水平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相对落后的陕西工业发展起到示范作用。他们的到来,为陕西工业带来新生力量。例如,抗战前,被称为现代工业之母的机械工业,在陕西几近空白,抗战时期迁来陕西的机器业共8家,陕西工业的许多母机,象纺织机、柴油机、弹花机、造纸机以及制造枪炮的机器设备和农具等,大都是这些工厂带来和制造的。而陕西纺织工业9万纱锭中有近4万是迁陕工厂生产的。其它迁陕工厂如面粉工业的大新、福新,火柴业中的秦昌、协和等,都是该行业的骨干。不仅如此,工厂内迁,还带来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为陕西战时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奠定了基础。

第三,国民政府的重视和政策鼓励。1934年,国民政府就提出“开发大西北,建设西安”的口号,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再次亲赴西北各省视察,确定“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国民政府还多次组织专家对西北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实地考察。由于国民政府的倡导,使得许多有胆识的企业家将投资重心转移到西北,尤其是陕西。同时,国民政府又按照战时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建立起战时经济体制。在扩展国营工业的同时,还大力扶持民营工业。如国民政府在1938—1939年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暂行

^①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5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条例》、《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以及《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等法规,规定凡是中华民国人民,在后方兴办有关国防民生之重要工矿业者,均可呈请奖励。政府则从保息、补助现金、减免各种捐税等几个方面对工矿业发展予以奖助。^①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对内迁民营厂矿给予资金协助。截止1941年6月底,国民政府对内迁民营厂矿的各种放款(包括迁移、营运资金、建筑设备、疏建和保护工程及招募技工等放款)总计达2003万元。^②而且,对后方原有近代工业凡有关国防民生,营业有发展希望的,一律给予贷款。另外,国民政府还积极支持内迁工厂重建工作。对搬迁工厂的选择厂址,建厂复工,均由政府划定范围,贷款购地,然后依照计划分配于各工厂,并设立专门委员会,主持此区域内通道、货站、电力、水利等公用事业^③,有力地帮助了内迁工厂迅速恢复生产。由于国民政府对发展后方工业的重视和鼓励,形成推动陕西工业发展的动力。据统计,陕西省在1941—1942年两年间,申请创办各类工厂140余家,创办煤矿、铁矿、笔铅矿等厂矿100余家。^④

第四,战时军需民用的增加为陕西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商品市场。陕西战前工业基础薄弱,产品质次量少,在市场上所占比重较低。抗战爆发后由于抵制日货和日本封锁国际通道所造成的进口商品锐减,以及沦陷区工业的被破坏,使得后方的商品市场异常活跃。同时,战争导致国内市场流通迟滞,舶来品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商品逐渐退出内地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军队和党政机关

^① 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单位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载《工商经济丛刊》第2辑,1943年重庆版。

^④ 曹敏:《抗战时期企业迁陕概况及对陕西经济发展的作用》,载《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后撤,大量公教人员及内迁工厂的职工家属、以及从沦陷区出逃的难民相继涌入陕西,使城镇人口急剧增加,日用消费品消耗量加大。再加之长期抗战引起的机械、弹药、衣物、药品、燃料、电材等战争物资的巨大消耗,有力地刺激了军工、制药、燃料、化工、电材等行业及动力工业和矿业的发展。这些军需民用的增加使市场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陕西工业品供不应求,竞争压力减轻,为其工业的开发提供了充分的发展余地。

第五,工合运动的推动。工合运动,是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简称,它是抗战时期群众性的经济救亡运动。其发起人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及尼姆·韦尔斯3人。其目的是利用难民、流亡的技术工人及当地的民众和资源,开办各种形式的适合战时需要的加工工业,支持抗战。陕西因地处抗战后方且工业发展落后,因而成为工合协会选定的第一个基地。1938年夏,艾黎率领1000名难民到达陕西宝鸡,利用从汉口运来的机器,迅速成立了包括酒精、纺织、制革及运输等业在内的80多个工业合作社。该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西北办事处成立,这是工合委员会全国5个办事处中成立最早的一个。到1940年,西北办事处下辖18个事务所,大小合作社423个,社员5572人,股金54783元,各项指标分别占全国5区总数的31.6%、34.1%、32.4%、20.9%。^①西北办事处内,除晋南、鄂北的游击区外,大型工矿较多,有的装备先进,能进行近代化的机器大生产,成为当地政府经济计划及工业建设的重要部分。1939年,延安工合社发展到15个,每月生产军装13500件、军帽1580顶、肥皂4000条、牙膏3000筒、粉笔50000支、墨水800瓶、麻纸600令、纱布480磅、棉

^① 沈雷春:《中国战时经济建设》,上海世界书局1940年版,第47页。

布 14700 码等。^① 有的工合社还制造手榴弹、刺刀, 试制各种枪支, 支援前线供部队杀敌之用。工合运动在当时大后方的工业生产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1939 年 12 月, 工合组织的月产值为 400 万元, 而内地全部内迁工厂的月产值也不过 2083 万元。1942 年, 在纺织、造纸、肥皂等产业中, 工合组织的产量约占消费总量的 10%。^②

三 发展特点

抗战时期, 陕西的工业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 表现出典型的战时经济特征。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后实行了严格的战时经济政策, 在工业生产中计划性很强。其管理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工业上, 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轻工业控制也较为严格, 例如, 陕西战时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就由西北军需处负责管理, 从原料分配、产量及市场等方面严格控制, 目的是为保证足够的物资以供军队使用。在各类工业产品中, 战争物资占有很大比重。陕西的纺织业从 1938 年起承织军布, 承担的份额不断加大, 尤其象大华纱厂、申新四厂、咸阳纺织厂这类大型工厂更是以军布为主要产品; 面粉业在 1942 年以前, 各大面粉厂都以 2/3 的生产力磨制军粉; 化学工业中, 生产的酒精主要用作汽油的代替品, 以解战时汽油短缺的燃眉之急。

伴随着战争的爆发及深入, 陕西工业从工厂的数量、投资、设备、人力等方面急剧膨胀。1937 年全省增设工厂 6 家, 而 1941 年

^① 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 第 241 页。

^② 左文:《不应紧缩的工货农贷》, 载《新华日报》1942 年 3 月 21 日。

就增设了 71 家, 1942 年又新增 72 家, 这两年新增工厂数为抗战前期 4 年总数的 1.4 倍。^① 其发展速度之快, 是与日军不断推进侵略, 抗战进入相持的艰难时期, 陕西在抗战大后方中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上升相关联的。由于陕西的工业繁荣并非建立在原有工业发展基础之上, 因此, 政府在资金、技术及人才各方面的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战局紧张时, 军需增加, 政府对工业的扶持力度加大, 工业发展速度就加快; 战局一旦缓和, 政府财政的窘迫及技术人员短缺等不足就凸现出来, 政府对工业的扶持力度便相应减弱。同时,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国民政府抗战意志衰退, 其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的消极影响, 加之日本切断滇缅公路, 使大后方生产所必需的机械设备和原料进口受阻, 这一切使得陕西工业和整个大后方工业一样, 在经历了短暂的 5 年繁荣期后, 很快便跌入低谷, 1945 年抗战结束后, 随着内迁企业的大量回迁, 对陕西乃至西北的开发“不幸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停顿了”。

其次, “嵌入型”经济的局限, 使得大机器生产和手工操作并存。陕西战时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很大程度上并非当地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 它不属于自身“演发型”经济, 主要应归功于拥有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及雄厚资金而强行“嵌入”的外部企业。然而, 由于战争环境的紧迫性、陕西近代工业基础又十分薄弱、以及“嵌入型”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等原因, 决定了工厂内迁这一“移植”的先天不足和不确定性。这些内迁企业和国民政府投资兴办的企业并没有通过连锁、辐射作用与当地原有的落后经济相融合, 而是自成体系, 与本地原有经济成份相互隔离, 由此形成战时陕西工业生产中大机器生产与手工操作同时并存、兴盛的局面。

^① 陈舜卿:《陕甘近代经济研究》, 第 63 页。

例如,陕西纺织业就明显地可分为3个不同类别:一是由国家资本或实力雄厚的民族资本控制的大型纺织企业,如大华纱厂、申新四厂、咸阳纺织厂等,他们资金雄厚,设备多为进口,以承织军布为主,效益良好;第二类是弱小的民族资本经营的中小型纺织企业,如宏丰、中兴、裕民等厂,他们的设备大部为国产,动力以人力为主,产品中军需民用参半;第三类则是那些资金、规模都无法与前两类相比,但数量却占有很大优势的家庭纺织手工业。它们完全靠手工操作传统的木制或铁制纺机,产品除自用外,大多销售于省内外的农村市场。由于战时军需民用增加,使得战前遭受洋布冲击、一度萎缩的传统手工业再次蓬勃发展。1943年陕西全省共有手工纺织工厂约900家,拥有石丸式、高阳式织机1万架左右^①,达到手工纺织业的鼎盛时期。除了手工纺织业,手工粮油加工业、木材采伐业、造纸业及各种矿冶业也都发展很快。其中,榆林毛毯、大荔织绒与皮袋、南郑篾织、凤翔漆木与酒、同官陶瓷以及陕南各县的纸张,均属质佳工精的特产。这些手工行业以规模小、资金少、便于零星分布、易转移的特点而迅速崛起,与大机器生产企业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地共同为巩固大后方、支撑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然而,由于那些土生土长的当地企业没能很好地利用外来企业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等优势来改造自己、提高生产效益。因此,等到抗战结束后,大量内迁企业重返故地,战时环境改变,商品市场重又变得狭窄,使得刚刚呈现初步繁荣景象的陕西近代工业遭受挫折,机械化程度及比重相对于抗战时期大大降低。

再次,民营企业出现了集中化现象。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内迁企业中,目的是为了解决运输中的困难。为了提高车辆的利用

^① 魏永理:《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第166页。

率,减少运费,内迁厂家便联合起来成立合组运输队,自筹汽车进行迁运。到达目的地后,又为了解决建厂用地、治安、水电、厂房建筑、劳工福利等问题而自行联合,与当地政府进行交涉。建厂投产后,为了利用设备、承揽工活、求购原料,又互相联合。这样,各行业都相继出现了一个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工业集团。其中以西安市纺织业中的联合织布厂最为典型。当时国民党西北军需局为了保障军服供应,对纺织业的纱支进行统配,规定不织军布就不供给纱支,同时规定至少拥有20台织布机的厂家,才能和军需局签订合同。为了适应需要,西安各手工织布厂便成立了联合织布厂,统一领纱、交布。该厂后来发展成军布厂联合办事处,其职能扩大到对各小厂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根据产品质量为其定价,还可代表各厂对外办理一切交涉业务,并调节厂家之间的纠纷。民营企业的集中化对提高企业设备的利用率、监督产品质量以及相互交流管理经验,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最后,在工厂的地域分布上,改变了过去工厂多集中于西安市的特点,分布于全省各地,尤以陇海铁路及川陕分路沿线为多,布局趋于合理。抗战前陕西工厂数不仅少,而且几乎全都集中在西安市。抗战爆发后,工业发展速度加快,为避免敌机空袭而不宜将工厂集中一地,同时,为充分利用本地的矿产及物资资源,各地纷纷设立工厂。据统计,1937年至1942年新设工厂(含内迁工厂)共105家,位于西安市47家,其余则沿陇海、川陕、咸阳等路之各重要市镇,均渐发展。其中,宝鸡8家,泾阳8家,眉县7家,同官5家,宜川5家,蔡家坡3家,南郑3家,城固3家^①,还有其他各地,涉及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区域。

^① 以上数据根据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编印:《陕西经济十年(1931—1941年)》,第161—174页“陕西省现有工厂一览表”整理而得。

四 积极作用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 陕西人民克服困难, 努力开拓, 表现出极大的抗战建国热情, 使这一时期陕西工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工业的繁荣, 对于支撑抗战、稳定后方、改变全国的工业布局和陕西的经济结构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 保证了军需民用, 既支持抗战, 又稳定了后方。在维持、推动战争的诸多因素中, 经济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 在工业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尽陷敌手之后, 陕西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这一时期, 它的工业发展在大后方各省中仅次于四川、湖南, 居于第三。尤其是与军需民用密切相关的面粉业和纺织业, 更是成绩显著。1943年, 大后方各省日产面粉共约3万袋, 陕西一省便有1.35万袋, 位于第一。1945年, 大后方各省纺织厂共有纱锭280380枚, 陕西省即占有74680枚, 仅次于四川, 位居第二。^① 当时全后方棉布月产量为14万匹, 而雍兴一家产纱量就可织布9万匹以上。1941年第三次长沙保卫战前, 国民政府从各地抽调官兵、物资, 仅陇海路洛阳到宝鸡段就运输官兵达200万人次、军品超过40万吨。^② 显然, 陕西人民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 以自己的行动承担起了支持抗战和稳定后方的双重任务。

(二)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国工业布局, 对陕西的经济结构转换产生了积极影响。战前, 我国工业区位分布畸形, 近代工业多在沿海、沿江一带。据1937年实业部的统计: 陕西近代工业企业仅

^①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 第267、408页。

^② 西北公路局编《西北公路月刊》, 1942年第1期, 第97页。

有10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0.25%;资本额仅有2757000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0.74%;工人只有4635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01%。抗战爆发后,陕西工厂数逐渐递增,至1942年,已有工厂385家,在大后方各省新设工厂数中,仅次于四川及重庆地区,位居第二,西北地区第一。占国统区工厂总数的10.24%;动力设备有13855匹马力,占国统区总数的9.63%;资本额105319000元,占国统区总额的5.43%;工人总数为23510人,占国统区的9.74%。^①这一时期,陕西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工业的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前全国东西部工业的不合理布局,增强了西北地区的工业力量。当然,抗战胜利后,沿海地区工业出现新的集中,工业地理面貌迅速改变,但是,陕西工业在抗战期间的兴起,毕竟在客观上调节和改变了全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同时,战时大量工厂内迁,不仅刺激了陕西近代工业的发展,而且,造成了近代工业新的生长点。1938年8月,蒋介石手令迁陕工厂以宝鸡为目的地,截止1941年,迁到宝鸡地区的工厂有申新纱厂、洪顺机器厂、华兴机器厂、民康毛纺厂、民康药棉厂、福新面粉厂以及大新面粉厂等,经过3年不懈努力,一个初具规模的“秦宝工业区”在黄土高原上形成,由此奠定了宝鸡成为西北地区工业重镇的地位。^②

近代以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步履蹒跚,陕西仍然保持着以传统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近代工业只能缓慢、零星地发展。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陕西有计划、上规模地大力发展工业,才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由于陕西地方工业的崛起,是以开发支持战争

①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6—97页。

② 秦宝工业区公共事业委员会筹委会:《秦宝工业区之缘起》,1941年9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的重工业为龙头的,国民政府曾集中投资兴建了一批石油、煤炭、电力、化学、机械、电器、建材等重工业企业,不少部门从无到有,填补了陕西重工业的空白,这样就改变了陕西的产业结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重工业在陕西经济中仍占据明显优势。同时,伴随着工业发展及门类的增多,陕西的农村人口、难民、移民的城市化过程加快,陕西的就业结构也有所改变。总之,这一时期陕西工业的快速发展,对其经济结构的转换具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尽管抗战时期,陕西的工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国民政府对开发陕西重视不够、投资不足,在工业建设中忽视对当地工业的扶持和人才培养等短视政策,以及国家资本的垄断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些都对陕西工业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但是,这一时期陕西工业发展的成绩毕竟是主要的,它达到近代以来最高峰,其积极方面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作者田霞,1959年生,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社科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